

江苏丹阳出土邵亢夫人强氏墓志校释

——与邵亢墓志的比照研究

孙瑞隆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丹阳郡强氏夫人墓志 2007 年出土于江苏省丹阳市, 系镇江市博物馆考古发现。墓主北宋丹杨郡夫人强氏, 夫君邵亢为北宋名臣, 谥安简。墓志拓片及录文见于《江苏丹阳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 内有较多阙误, 今予校补。志文内容可与史志相互补充、印证, 对研究强氏夫人及邵亢之制科、家族世系、生平事迹、母妻封号等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北宋; 邵亢; 强氏夫人; 茂才异等; 叙封; 墓志

中图分类号: K877.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5-0106-12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5.019

Annotation of the Epitaph for Mrs. Qiang'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Unearthed in Danyang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he Epitaphs for Shao Kang

SUN Ruil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China 621000)

Abstract: The tomb of Mrs. Qiang in Danyang County was unearthed in 2007 in Danyang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It is a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by the scholars of Zhenjiang Museum. The occupant of the tomb is Mrs. Qiang of Danyang Count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Shao Kang, the husband, is a contemporary famous minister. The rubbings and transcripts of the epitaph can be found in *The Excav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Joint Tomb of Shao Kang and His Wife in Danyang, Jiangsu Province*. There are many errors in the report, which are corrected now. The epitaphs of Qiang and Shao Kang can complement and corroborate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Mrs. Qiang and Shao Kang's family system, family lineage, life stories, and the titles of his mother and wife.

Key words: Northern Song Dynasty; Shao Kang; Mrs. Qiang; Mao Cai Yi deng; Xu Feng; Epitaph

2007 年 4 月, 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江苏省丹阳市大泊社区王家村发掘一座宋代竖穴土坑墓, 出土“(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一合。墓志为青石质, 平面呈正方形。志盖长 71.5 厘米、宽 77 厘米、厚 13.5 厘米, 楷书阴刻“丹杨郡夫人彊(强)氏墓铭”9 字。志石长 71.5 厘米、宽 78 厘米、厚 12.5 厘米, 志文楷书阴刻, 大部清晰, 共 24 行, 满行 28 字。强氏墓志可与邵亢墓志铭、史书列传、地方史志对照, 校正误、补史阙; 为了解和研究强氏及其夫君邵亢的生平、家世提供了可靠的

实物资料; 志文所载邵亢科举、历官等内容可与《宋史》《邵安简公墓志铭》(以下简称《邵铭》)《续资治通鉴》《重修丹阳县志》《丹阳县志补遗》《至顺镇江志》等文献相互补充、印证; 丰富了研究北宋名臣邵亢的资料; 志文所及毗陵、丹杨等地名, 为研究地名变迁提供了线索。

一、《报告》所录志文及其阙误

《东南文物》2018 年第 4 期刊载的《江苏丹阳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1] (以下简称《报

收稿日期: 2019-02-07

作者简介: 孙瑞隆 (1997—), 男, 河南平顶山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告》)公布了墓志拓本和录文。墓志字体规整,但志石多处磨泐,《报告》所录志文内容有较大阙误,对墓志的科学研究和使用造成了一定影响,今校补之。志文校补主要依据字形,次及文意,并以其他墓志用例佐证。原文迳录于下:


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并序/宣奉郎、守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同判登闻鼓院、赐绯鱼袋王□撰/

夫人姓强氏,世家毗陵。父讳弼,举进士中科,补秀州嘉兴县主簿,非其好/也,罢去不复仕。夫人幼而警悟,长而慧淑。主簿君奇之,属媒媼曰:“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足。”州里望族争问名,主簿君莫答也/。尚书安简公时为布衣,家丹杨,力学有奇声,而主簿君已先卒,其友侍郎/□公因君之志,遂以夫人归邵氏。夫人既归,以孝事其姑/,以和接其娣姒,以恩待其族姻,族姻无戚疏,悉得其欢心。公举茂/材异等,名闻天下。历职清近,佐佑枢机。夫人历封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人。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天子从之,追封其母葛氏为福昌县太君。夫人既贵显矣,未尝舍/妇事、纵游观;禄赐丰矣,不以奢服御、厚畜积,起居、饮食常若。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其有泰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公之以清德著闻当世,抑夫人有内助也。熙宁七年□□十七日,以疾终于亳州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七。后六十六日,公亦薨。其孤/奉二枢归葬于丹杨,实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子男二人:塏,守秘书省/校书郎;觿,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琬嫁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葛奉/世;琰嫁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孙男女二人。铭曰:/曲阿之东,耿岗之原。岿然高者,邵公之□;/祔而藏者,公之夫人。夫人翼翼,与公同德。/处丰不奢,为俭不嗇。以刑室家,施于族姻。/族姻以任,妾御称仁。逮事皇姑,矜式诸妇。/奉朝三宫,追荣及母。惟始惟卒,福祿公殁。/从公以归,万世之□。/

《报告》所录志文存在11处阙误。


1. 兼史馆检讨

2. 琬嫁大理寺检法官

“检”字拓本作,应录为“检”。后文“大理寺检法官”亦如是。“扌”“木”形近而混,石刻铭文中习见。

史馆检讨,官名。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置,以他官兼任,掌编纂史籍。^{[2]271}检法官,官名,宋朝三司、户部、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及诸路提点刑狱皆设,负责提供检详各种条法。^{[2]721}

3. 守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同判登闻鼓院、赐绯鱼袋王□撰

空围处拓本作“”,几不可识,惟右上似有一捺笔,疑为“介”字。王介^①,字中甫,见于《宋史》《宋会要辑录》《常山县志》。

《宋代京朝官通考〈2〉》“判鼓司,判登闻鼓院,同判登闻鼓院,监登闻鼓院”章,自“景祐元年(1034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王姓仅王介一人,“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王介。《会要·职官》六五之三四:‘[熙宁三年(1070年)十月十九日]集贤校理王介罢判鼓院。’^[3]《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亦载: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月二十二日“集贤校理王介、馆阁校勘刘攽罢判鼓院、同知太常礼院,并令归馆供职。”^{[4]4817}此处时间不同,《宋代京朝官通考〈2〉》误。可知熙宁三年(1070年)之前王介已官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集贤校理”“同判登闻鼓院”之职衔与志文合。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条目下有: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十七日,“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就秘阁考试制科。奎等上王介、苏轼、苏辙论各六首”,“二十五日,帝御崇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著作佐郎王介、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河南府澠池县主簿苏辙。……轼策入第三等,介入第四等,辙入第四次等。诏轼为大理评事、佾书凤翔府判官公事,介为秘书丞、知通州静海县,辙为商州军事推官”。^{[4]5475-5476}“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只在下三等取士,中选者一般均是第四等。嘉祐六年

①《宋史》中王介有二,一北宋人(1015—1087年),家衢州常山(今浙江省常山县),仕仁宗、英宗、神宗朝;一南宋人(1157—1213年)家婺州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仕光宗、宁宗朝。本文所述为前者。

(1061年)此次制科,苏轼、苏辙入第三等,后苏辙因触怒考官被降第四等。^{[4]5476}可知王介原官著作佐郎,嘉祐六年(1061年)以制科四等除官秘书丞,静海知县,与志文中“守秘书丞”合。“秘书丞”从五品上,前加“守”说明阶官低于职事官^{[5]884},志文中“宣奉郎”从七品下阶,此处亦合。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韩琦、曾公亮、欧阳修应皇帝诏,举“才行兼善者”二十人,“时被荐者蔡延庆、夏倚、王汾、叶均、刘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张公裕、王介”“十一月六日,召权提点陕西刑狱、尚书度支员外郎蔡延庆等十人就试馆职”。^{[4]5860}《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八》:“熙宁元年(1068年)罢试诗赋,而更以策论。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论试于学士院,皆除馆职。”^{[4]5788}《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六月二十八日,“学士院试职方员外郎王介、太常博士安(寿)[焘],策、论稍优,著作郎蒲宗孟、陈侗、光禄寺丞朱初平策、论稍堪,介、焘充秘阁校理,余充馆阁校勘。介等皆先朝得旨召试故也”^{[4]5860}。《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熙宁二年)八月十四日,以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陈襄、集贤校理王权、秘阁校理王介、安焘、李常、馆阁校勘刘攽考试开封府举人。”^{[4]5628}则王介熙宁二年(1069年)六月策论得馆职秘阁校理。

梳理可得王介历官。嘉祐六年(1061年)前,著作佐郎;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始,任秘书丞、静海知县;嘉祐六年(1061年)到熙宁二年(1069年)间,得职方员外郎官;熙宁二年(1069年)六月始,任秘阁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官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熙宁三年(1070年)十月任集贤校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合称“三馆”,“皆寓崇文院”。^{[4]5788}“集贤校理”“秘阁校理”“史馆检讨”均为馆职,“史馆检讨”或因为王介兼职,史传不载。《至顺镇江志》载:“王介。衢州人,居丹徒,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赠少师。”^{[6]1018}《常山县志·第二十四编·人物传》^[7]:

“王介(1015—1087年),字中甫,今芙蓉乡章舍人”,“初以太学生任福昌主簿,宋庆历六年(1046年)中进士,嘉祐六年(1061年),应试直言极谏科”,“名列贤良第一”,“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后“闲居判鼓院”。记载未详,可补之。

王介与邵亢(1014—1074年)时代相仿^[1],且为同乡,政治方向近,都有文学上的声名^[8],很可能有交集^①。

4. 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疋

5. 𠂔,太常寺太祝

6. 惟始惟卒,福禄公𠂔


查《报告》概以简体通行字录志文,故“疋”“𠂔”“𠂔”应分别录为“匹”“箠”“齐”。

“疋”为“匹”之异体。《汉语大字典·疋部》:“疋。同‘匹’。《广韵·质韵》:‘匹,俗作疋。’《字汇补·疋部》:‘匹,匹、疋二字自汉已通用矣。’有相当;相配意。《白虎通·嫁娶》:‘配疋者何?谓相与偶也。’”^{[9]2940}可知“疋”即“匹”也,此处为“配偶”意。“疋”应录为“匹”。

“𠂔”为“箠”之异体。《汉语大字典·𠂔部》:“𠂔。同‘箠’。《集韵·支韵》:‘𠂔,或作箠。’”^{[9]5125}《康熙字典·𠂔部》:“《玉篇》或作箠。”^{[10]1542}《中华字海·𠂔部》:“同‘箠’。”^{[11]1757}“𠂔”应录为“箠”。

“𠂔”为“齐”之异体。《康熙字典·二部》:“《玉篇》:‘古文齐字。’”^{[10]12}《中华字海·厶部》:“同‘齐’。”^{[11]210}“𠂔”应录为“齐”。

7. 其友侍郎□公因君之志,遂以夫人归邵氏

所缺字拓本作,上为“艹”左边竖笔,右下为“寸”,依稀可辨识出“蔣”字。

蒋堂,字希鲁,宜兴人。《蒋公神道碑》载蒋堂“以皇祐六年(1054年)三月辛酉考终于吴郡灵芝坊私第”^{[13]461},“含玉之日,寿七十五”^{[13]464},可知其生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卒于皇祐六年(1054年)。夫人强氏之父强弼家毗陵,即今江苏省常州市。晋始置“毘陵郡”,“寻改晋陵”,“宋

①王介在北宋时期是著名诗人,有《王中甫诗集》传于世。与王安石少时即交好,和有《七古·和中甫兄春日有感》等诗,后因不支持新法,两人有了隔阂。《石林诗话》评其“博学擅机谑,尝举制科不中,与荆公(王安石曾封荆国公——笔者注)相游甚欢”。同苏轼、苏辙同仁宗朝制策登科,相交甚好,王介去世后,苏轼作《七律·王中甫哀辞》《七律·同年王中甫挽词》,苏辙作《七律·过王介同年墓》。连小刚,庞艳霞老师在《邵亢相关问题考述》一文“文学交谊”节指出《全宋文》收录有邵亢作品,邵亢亦不支持王安石变法,故此两人很有可能交集。



为常州毘陵郡”，“治晋陵县”^{[14]704}。《咸淳毗陵志·卷十一·科目》有“大中祥符元年姚晔榜”“强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进士”“蒋堂”^{[15]3045}。则强弼与蒋堂时代同，又是同乡。蒋堂长女“适刑部郎中、知制诰邵必”^{[13]464}，邵必又是邵亢叔父^{[12]7322}，所以蒋堂也能接触到邵亢。

蒋堂“举进士。明道初为侍御史。郭后废，堂与范公仲淹、孔公道辅极言不可。坐。黜为河南发运史”，后又“知益州”，后“以礼部侍郎致仕”^{[15]3119}。志文载“尚书安简公时为布衣，家丹杨，力学有奇声”，蒋堂“因公之志”让强氏嫁给了邵亢。《报告》推测“‘侍郎□公’可能为蒋堂”^[1]不误。


8. 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其有泰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

本句句读误，致文意不清晰。“左右使令”指左右服侍自己的人，韩愈《永贞行》诗中“左右使令诈难凭，慎勿浪信常兢兢”即是此意。“言”“色”对举，其意一也，“泰言得色”意为“自得的神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既是赞语，前半句亦应是赞语。如录文句读，意为“左右服侍邵亢的人看出来他有自得的神色”，意思就反了。此句应断为“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其有泰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

9. 熙宁七年□□十七日，以疾终于亳州之官舍

空围处拓本作、，应为“十月”。志文后文载“后六十六日，公亦薨”，查《邵铭》有“公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终”^{[16]489}。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溯六十六日，正在十月。据此，两处缺字应补为“十月”。

10. 曲阿之东，耿岗之原。岿然高者，邵公之□

所缺字拓本作，左为“土”，右上为“十”，右下可见“貝”下左撇，应是“墳”字。“坟”与“公之夫人”之“人”押韵。“岿然高者”指邵亢坟墓规模较大，葬地“耿岗原”是舒缓的丘陵岗地^[1]，坟墓相对于平地高，故言。

墓志中亦有类似用例。《唐故海州司仓高君墓志铭》有“煞简易注销，不议滕公之坟”^[17]。《元辽阳路盖州判官文贞安公墓志铭》有“我铭不谀，维公之坟”^[18]。《寻管香墓志铭》有“巍然而七尺者，维公之坟”^[19]。

11. 从公以归，万世之□

所缺字拓本作，右为“月”，左边构件大部可辨，应为“其”，整字应是“期”字。“期”与“福禄公齐”之“齐”押韵，与“万世”文意相承。

二、邵亢母姓氏及封号

“叙封”是封建时代按照官吏的官阶和爵位，封其妻、母、祖母、曾祖母的制度，“封赠之典，旧制有三代、二代、一代之等，因其官之高下而次第焉”^{[12]2551}。

志云：“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天子从之，追封其母葛氏为福昌县太君。”《华阳集·卷三十一》有《丁忧人邵亢亡母刘氏可追封孝感县太君制》（以下简称《邵制》）：“今尔子愿上一秩，欲追荣于母阡。朕惟亢儒馆之彦，构家艰凶，夫岂拘以常文哉。其泽孝感以封之，时惟尔有子之庆。”^{[16]399}《华阳集·卷三十七》之《邵铭》亦载：“俄丁母忧，愿还一官以追封其母，朝廷许之。封其母孝感县太君。”^{[16]490}三处记载涉及两姓三封号。《报告》考证言“今应以志文为据纠正史误”^[1]，意即志文邵亢母为葛氏，封号福昌县太君，《报告》误。

按王珪知制诰十余年，《华阳集》中之《邵制》亲出其手，断然不会有误。又《邵铭》载：“今公子以公治命，属予铭”^{[16]492}，既是邵亢之子请托，又岂无行状供其参考？《邵铭》有“封其母孝感县太君”^{[16]490}“考讳余，赠太师。妣刘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16]492}。《邵制》《邵铭》均言“还一官”以追封其母，而《强氏夫人墓志》载“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事由既非一也，事亦不同，不可混为一谈。邵亢确有母刘氏，先追封孝感县太君，后又追封建安郡太夫人。《宋史·志第一二三·职官十》“叙封”条目载：“父亡无嫡、继母，听封所生母。”^{[12]2551}刘氏应为邵亢嫡母，葛氏为其生母；嫡母刘氏封孝感县太君之事早，祀南郊，请追封母葛氏晚。

三、强氏夫人相关

（一）强氏家世

志云：“夫人姓强氏，世家毗陵。父讳弼，举进士中科，补秀州嘉兴县主簿，非其好也，罢去不复仕。”

强氏夫人世家毗陵，即宋时常州，毗陵为其郡号^{[15]2948}。其父强弼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登进士第。《宋会要辑稿·选举七》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四月十二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帝乃临轩拆封唱第，得姚晔已下三百七十人，第为四等，并赐及第、同出身、同三礼学究出身。”^{[4]5392-5393}《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月十六日，诏应登科人并庭赐绿袍靴笏”“五月初六日，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姚晔为将作监丞，第二人祖士衡、第三人郑向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第四、第五人为节察推官，余如景德二年之例”^{[4]5267}。景德二年（1005年）四月十四日，宴新及第进士李迪等于琼林苑，“第一等并九经第一人试秘书省校书郎、知县，第二等以下判司簿尉”^{[4]5266}。宋朝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参军，县主簿，县尉，简称判、司、簿、尉^{[2]448}。由“嘉兴县主簿”知强弼为进士第二等以下，强弼被罢官后再未出仕。

（二）强氏其人

志云：“夫人幼而警悟，长而慧淑。主簿君奇之，属媒媼曰：‘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匹。’州里望族争问名，主簿君莫答也。”强氏幼时就机敏过人，长大后聪慧贤淑，受父亲喜欢。父亲以其不是一般女子，嘱咐媒人为她找个好夫婿。州里的名门望族都有求亲之意，父亲一概未允。“问名”是古婚礼中“六礼”之一，指女方接受男方的求亲意向（纳采）后，男家具书遣媒人携雁问女子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归卜其吉凶”^{[20]16831}，因“纳采”之后才能问名，故此“问名”仅为求亲意。宋代的士庶礼“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其无雁奠者，三舍生听用羊，庶人听以雉及鸡鹜代”^{[12]1741-1742}，实际上做了简化。

志云：“夫人既归，以孝事其姑，以和接其娣姒，以恩待其族姻，族姻无戚疏，悉得其欢心。夫人既贵显矣，未尝舍妇事、纵游观；禄赐丰矣，不以奢服御、厚畜积，起居、饮食常若。”夫人嫁至邵府后，孝敬婆婆，“矜式诸妇”。与丈夫兄弟的妻子和气相处，很好的对待家族和姻亲，远近关系的亲戚都对她满意，所谓“族姻以任，妾御称仁”。夫人显贵之后并没有舍弃掉女功，不纵情游乐；家里财物多，也不穿贵重衣服，不过多作积蓄，吃住和

原来一样简朴，铭曰：“处丰不奢，为俭不嗇”。

（三）强氏历封封号

志云：“夫人历封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人。”《宋史》载：“咸平四年（1001年），从舍人院详定群臣母、妻所封郡县，依本姓望封。”^{[12]2551}“姓望”即郡望。宋承唐制，“视本官阶爵”，“定文武郡臣母妻封号”^{[12]2550}。

晋阳县君。此“晋阳县”非太原郡之晋阳，应为宋时常州所辖县。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晋阳县”条：“南朝梁置。隋废。故治在今安徽东流县北”^{[14]705}。唐时有“杨相如先天中为常州晋阳尉”^[21]的记载，知唐时晋阳县仍属常州，可资参证。

晋陵郡君。“晋陵”指强氏的籍贯“毗陵”。晋太康二年（281年）初“分吴郡置毗陵郡”，晋永嘉五年（311年）“改毗陵县为晋陵，徙治丹徒县”^{[22]97}。隋为“毗陵郡”，“唐为常州晋陵郡，宋为常州毗陵郡，治晋陵县”^{[14]704}。

丹杨郡夫人。“丹阳郡”为强氏郡望，“天宝元年（742年）置，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润州”^{[22]100}，“即今江苏江宁县治”^{[14]109}。查“丹阳”历史上有“丹杨”“丹扬”“丹阳”三种写法，“晋宋及后魏志皆作‘丹杨’”^{[14]109}，今作“丹阳”。

四、邵亢相关

（一）婚姻

志云：“尚书安简公时为布衣，家丹杨，力学有奇声，而主簿君已先卒，其友侍郎蒋公因君之志，遂以夫人归邵氏。”“丹杨”即宋润州丹阳县^{[22]95}。邵亢未入仕途时就勤勉好学，很有声名，擅诗文。“幼聪发过人，方十岁，日诵书五千言。赋诗豪纵，乡先生见者皆惊伟之”^{[12]7322}，开封府两试皆因误用韵不第，“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也”^{[16]489}。强氏父弼曾言：“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匹”，称赞强氏不同于寻常女子。强弼早亡，其友侍郎蒋堂依着强弼的意思将强氏许配给邵亢。

（二）邵亢其人

志云：“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其有泰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邵铭》云：

“其为人忠硕方靖，庄外而敏中，与人不苟合；为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见思。其议论、文章，堂皇温雅，一时台阁闻人，盖有所不及。少历艰勤，及贵盛，始终无少易，禄入多以周宗族。”^{[16]492}

邵亢入仕前，身边服侍的人未能识待他，他仍然安定自若；远近族人都能照顾得到，以清名著闻当世。外表庄重安静，内里机敏，有原则。处理政务宽严相济，百姓怀念。所作文论辞章，文辞典雅，台阁间人多有不及（《中国书法大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4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2004年，第520页）录有邵亢）。年轻时间生活艰辛，显贵之后也未改变本心，俸禄多拿来周济族人。

（三）邵亢制科情况

志云：“公举茂材异等，名闻天下。历职清近，佐佑枢机。”邵亢，字兴宗，丹阳人，赠吏部尚书，谥曰安简^{[12]7322-7324}。政和上舍生^{[22]587}，宝元中祀乡贤^{[22]580}，两次就试开封府不第，制科落第一次，最后献《康定兵说》策入制科“茂才异等”。铭曰“奉朝三官”，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邵铭》亦云：“公始以羈孤自拔，及历事三朝，位二府，显矣”“有谋有猷，天子是从，帝曰汝来，其辅予政”^{[16]492-493}。

《至顺镇江志·卷十八·人才》“邵亢”条目载：“再试开封府，皆第一，中茂材异等科。”^{[6]966}邵亢“两试进士于开封府，皆误用韵，弗中，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也”^{[16]489}。《宋会要·选举一〇》：景祐五年（1038年）六月十六日，“御史中丞晏殊、翰林学士宋郊、知制诰郑戡、直史馆高若讷赴秘阁考试制科，殊等上田况、张方平、邵亢论各六首”，“七月二十七日，帝御崇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太子中允

田况、秘书省校书郎张方平、茂材异等进士邵亢”，“况策考入第四等，方平入第四次等，亢不入等”。^{[4]5465-5466}《邵铭》：“时布衣被召者十四人，既试秘阁，独得公一人。及试崇政殿，除建康军节度推官。”^{[16]489}《宋史·列传七六》：“范仲淹举亢茂才异等，时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试崇政殿，独亢策入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12]7322}，“公举茂材异等”即指范仲淹举荐他一事。当时有人批评邵亢策论“字少，不应式”，与宰相有族姻才得预选，所以“报罢”，即秘阁试“策入等”，试崇政殿“不入等”，《宋史》文误，据《宋会要辑稿》《邵铭》应改之为“时布衣被召者十四人，独亢策入等。试崇政殿，除建康军节度推官”。景祐四年（1037年）范仲淹始知润州，因而能够向朝廷推荐身为布衣的邵亢参加景祐五年（1038年）的制科^[8]。此即邵亢第一次参加“茂才异等科”之情况。

康定二年（1041年），“赵元昊反，兵出数不利，于是诏求方略之士”^{[16]489}，邵亢献《康定兵说》十篇。《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召试”载：“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四日，学士院试郊社斋郎丘良孙，策三下；应茂材异等科邵亢，策三上”“诏良孙、亢并陕西初等职官”^{[4]5847}。此即志文所言“举茂才异等，名闻天下”。二月甲申，“以应方略人，郊社斋郎邱良孙^①权耀州观察推官，布衣邵亢权邠州观察推官。亢尝举制策，报罢，于是献康定兵说，与良孙俱得试用”^[8]。可知丘良孙与邵亢是“献文召试”，所献文章与兵书武学、战守方策有关。邠州时属陕西路，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后“又召试秘阁，授颍州团练推官”^{[16]489}。按邠州观察推官为两使职官，非初等职官，《宋会要辑稿》误。邵亢应茂才异等科得授邠州观察推官，但未到任，后献方略召试秘阁，得颍州团练推官的职务^②。

①《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847页）作“丘良孙”，《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4页）作“邱良孙”，考其确为一人，今照录原书文字。《欧阳修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611页）有“论举馆阁之职札子”说“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丘良孙者”。《宋人轶事汇编（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38页）记载，欧阳修“初移滑州”时，给某高官投去“近著十篇”。后回京知制诰，发现丘良孙把这几篇文章“盗为己以贽”。后欧阳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可知丘良孙所献文系剽窃而来。

②《邵亢相关问题考述》一文“科举入仕”节认为“邵亢参加的学士院试与秘阁试是两次不同的考试，即先参加学士院试得授陕西职官，后参加秘阁试得授颍州团练推官（初等职官）”，以此化解“邠州观察推官（两使职官）”与“陕西初等职官”的冲突，然颍州在安徽阜阳，与“陕西初等职官”之“陕西”不合。《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韩）维免，以邵亢代之。上以亢未尝历陕西任，以孙永代之”。易知邵亢未实际到任邠州观察推官。

宋初制举有“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4]5456}三科。“茂材异等科”亦属制科，置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以待布衣之被举者”，“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4]5461-5462}。邵亢第一次参加茂材异等科即是先试秘阁，后天子亲试崇政殿。《邵铭》载：“范文正公举，应贤良方正科。”^{[16]489}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为仁宗初年为招揽人才而设之制举，“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12]2285}，邵亢布衣时不能预此科，且《强氏夫人墓志》《宋史》《宋会要辑稿》并言“茂才异等”，易知《邵铭》误。

（四）祀南郊，请追封其母

志云：“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

宋仁宗末年形成皇帝三岁一亲郊的制度，每祀即有恩典^[23]。《梦溪笔谈·亲郊庙册文》载：“上亲郊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24]宋神宗时期的礼官李清臣指出：“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宫及太庙，谓之三大礼，本朝三岁郊祠，必先及景灵宫及太庙，盖因前制。”^{[25]7399}可见，三大礼制在唐代就已存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曲阜县为仙源县，建景灵宫。宋皇帝祭祀天地祖宗：先是到景灵宫，祭祀黄帝；然后到太庙，太庙是放置历代祖先灵位的地方；最后到南郊举行祭天仪式，南郊是祭祀天地的地方。

恩当进封。咸平二年（999年）十一月南郊赦书言：“父、母、妻并与官封、追赠”^{[4]2500}，其后仍之。《宋会要辑稿·仪制一〇》：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枢密副使李公弼言，乞以南郊封赠三代恩追亡子希逸、希仁一官，从之”^{[4]2508}。《宋会要辑稿·仪制一〇》：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建州观察司康继英乞将南郊加恩回授先祖再遇封赠一官，从之”^{[4]2506}。《宋会要辑稿·仪制一〇》：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直集贤院谢绛言：‘臣预奉郊祀，当加阶勋，望以加恩，特许追封亡母郡君之号。’诏特追封晋陵郡君”^{[4]2506}。可知天子南郊祭祀有“封赠三代”之制，陪祀应“加阶勋”。

（五）邵亢作为

《宋史·列传第七十六》结语赞邵亢“知太

常，裁损张贵妃恤典，颍王授室、公主下嫁，请用古典，可谓不愧其官守矣”^{[12]7333}。

1. 知太常，裁损张贵妃恤典

张贵妃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薨。《宋史·列传第七十六》“邵亢传”载：“张贵妃薨，立园陵，禁京城乐一月，亢累疏罢之。”^{[12]7322}《邵铭》载：“张贵妃薨，下有司议立陵庙，禁乐京师一月。公累疏论之，遂弛乐，亦不立陵庙。”^{[16]489-490}《宋会要辑稿·礼三三》：“（至和元年）十三日，诏京城禁乐一月。自启攒至葬，复禁止。”^{[4]1477}

《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张贵妃，河南永安人也。……妃幼无依，钱氏（张皇后母——笔者注）遂纳于章惠后宫寝。长得幸，有盛宠。妃巧慧多智数，善承迎，势动中外。庆历元年（1041年），封清河郡君，岁中为才人，迁修媛。忽被疾，曰：‘妾姿薄，不胜宠名，愿为美人。’许之。皇祐初，进贵妃。后五年薨，年三十一。”^{[12]6240}《宋会要辑稿·后妃一》“温成皇后张氏”条：“幼入宫，为御侍。庆历元年（1041年）封清河郡君，进封才人、修媛。后忽被疾，请下迁为美人。八年十月封贵妃。生庄顺、庄定、庄慎三大长公主。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八日薨，年三十一。追册为皇后，谥曰温成。葬奉先资福禅院，立庙于园侧，以知制诰岁时行礼。嘉祐七年（1062年）正月更庙为祠殿，遣宫臣以常饌致祭。”^{[4]250}时张氏盛宠，远超曹皇后，“妃宠爱日盛，出入车御华楚，颇侵后饰”^{[26]719}。张氏薨时曹皇后仍在，但仁宗以皇后之礼为张氏发丧，《宋史》称“治丧越式”。

《宋会要辑稿·礼三三》：“（皇祐六年（1054年））十二日丁丑，册谥曰温成皇后。”^{[4]1478}《宋史·本纪第十·仁宗二》：明道二年（1033年）十一月，“追册美人张氏为皇后”^{[12]121}。张氏下迁为美人是在庆历元年（1041年）后，则《宋史》明道二年（1033年）追册皇后的记载误。

“（孙沔）至南京，召为枢密副使。张贵妃薨，追册为皇后，命沔读册。故事，正后，翰林学士读册”^{[12]6910}。沔答曰：“陛下若以臣沔读册则可，以枢密副使读册则不可”^{[12]6910}，遂求罢职。仁宗改令宰臣梁适读谥册。“张贵妃薨，有司请依荆王故事，辍视朝五日，或欲更增日，听上裁，乃增至七日。（吕）景初言：‘妃一品当辍朝三日，礼官希旨，使

恩礼过荆王，不可以示天下。’”^{[12]7120}仁宗不许，至和元年（1054年）十月十六日，“温成皇后神主入庙，帝不视事，宰臣率百官奉慰”^{[4]686}，辍朝七日。

张皇后“初谥恭德”，言官谏“德”字与太宗诸后谥同，不当，改谥“温成”，其谥册云“盗惊庐微，挺身以卫至尊；时丁旱暵，刺臂以祈来飨。爱君之烈，何谢古人”^{[4]1477-1478}。《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五》：“昔者殿庐微卫卒夜入宫，妃挺身从别寝来卫朕。尝祷雨宫中，妃刺臂血书祝词，外皆不得闻。”^{[26]719}《宋史·列传第七七》载：“禁中卫卒夜变，帝旦语二府，奖张贵妃扈蹕功”^{[12]7335}张皇后的主要功绩是护卫皇帝和血书祷雨。谥册所及即庆历八年（1048年）的“宿卫之变”，“崇政殿亲从官颜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谋为变，杀军校，劫兵杖，登延和殿屋，入禁中，至寝殿”^{[26]654}，曹皇后镇定处置化解了风险，“（张）美人卒用扈蹕功进妃位”^{[25]3969}。《宋史》称皇祐元年（1049年）册贵妃，而《宋会要辑稿》称庆历八年（1048年），据“宿卫之变”事可知庆历八年是。

2. 颖王授室、公主下嫁，请用古典

“授室”指把家事交给新妇，引申为娶妻^{[20]694}。《邵铭》：“累迁祠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兼判尚书礼部。尝言：‘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家。始今皇子授室，愿于古婚礼不可废；公主下嫁，不可杀舅姑之尊，以屈人伦之序。’帝深纳之。”^{[16]490}《宋史·列传第七六》“邵亢传”载：“擢同修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国者先齐家，颖王且授室，愿采用古昏礼。公主下降，不宜厌舅姑之尊。’帝深纳之。”^{[12]7323}

“古婚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5]983}，其中“纳征”“亲迎”最为重要。《宋史·志第六八·礼十八》：“嘉祐初，礼官言：‘礼阁新仪，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礼。古者，结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择之意，谓之纳采。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吉，以告女家，谓之问名、纳吉’”“若纳成则既有进财，请期则有司择日”^{[12]1737}。又“品官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庙见、见舅姑、姑醴妇、盥馈、飧妇、送者，并如诸王以下婚。四品以下不用盥馈、飧妇礼”^{[12]1741}。宋王室婚礼依然不避繁琐，从“纳采”到“亲迎”基本完备，但

“选尚一出朝廷，不待纳采。公主封爵已行诞告，不待问名”，并不全“六礼”，“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亦有简省^[27]。

北宋前期，为了让公主“避舅姑之尊”，令驸马“升行”，即将驸马辈分抬高一辈，此即邵亢所谏“不可杀舅姑之尊，屈人伦之序”。庆历二年（1042年）仁宗颁布的自今皇亲“尊卑差互者，不得为婚姻”^{[25]3287}的诏令。可知，当时皇家异辈为婚情况时有发生，这对英宗朝君臣总结前朝公主出嫁的利弊得失或有影响^[28]。

《宋史·本纪第一三·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语神宗曰：‘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义甚无谓。朕尝思此，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也？可诏有司革之。’会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12]162}。《宋史·志第六八·礼十八》：“神宗即位，诏以‘昔侍先帝，恭闻德音，以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宜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于是著为令。仍命陈国长公主行舅姑之礼，驸马都尉王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见舅姑行礼自此始。”^{[12]1737}

其实“国家旧制”乃敷衍之词，“升行”之制是从宋太宗的三个女儿（鲁国长公主、郑国长公主、万寿长公主）出嫁开始实行执行时间则是宋真宗朝，创立者是宋真宗^[29]。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五月初三日，宋真宗封宋太宗第四女宣慈长公主为鲁国长公主，下嫁左卫将军柴宗庆，“升其行为禹锡子”^{[12]9347}，柴宗庆由柴禹锡的孙子变成儿子，与父柴宗亮成了兄弟。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宋太宗第五女郑国长公主下嫁王克明，真宗诏“改名贻永，令与其父同行”^{[12]6347}。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二月，李遵勖尚宋太宗第九女万寿长公主，“初名勖，帝益“遵”字，升其行为崇矩子”^{[12]9354}。柴宗庆、王贻永（原名王克明）、李遵勖（原名李勖）三人娶公主后，辈分都升了一辈，名字相应地进行改动，以与改变后的辈分相符^[29]。可见“升行”即升辈分，皇帝以为固有之辈分不宜。查柴宗庆为镇宁军节度使柴禹锡孙、太子中舍柴宗亮子；王克明为宋初宰相王溥孙；李勖为宋李崇矩孙、李继昌子。宋太宗（生于939年），吴延祚（生于917年）、李崇矩（生

于924年)、王溥(生于922年)三人均属于前朝旧臣,且在宋朝立国之前已经是朝廷高官。宋太祖和宋太宗是兄弟,他们的公主辈分一致的,由于年龄差距嫁给了两辈人,宋真宗借驸马升行维持公主们伦理地位的平等,保持皇室和驸马家辈分的平衡,是“维护皇族辈分的权宜之计”^[28]。

五、家世传承

志云:子男二人:塤,守秘书省校书郎;箴,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琬嫁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葛奉世;琰嫁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

邵氏为宋代丹阳大姓,祖居河朔,五代时邵勋为避战乱渡江南下移居丹阳^[30]。志文载邵亢有子邵塤,邵箴,女邵琬,邵琰。《邵铭》载邵亢“曾祖讳勋,赠太子太保。妣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人”“祖讳遇,赠太子太傅。妣汤氏追封太宁郡夫人,继汤氏追封咸宁郡太夫人”“考讳余,赠太师。妣刘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孙男一人:缙,将作监主簿”^{[16]492}。《至顺镇江志·卷第十八》“[宋]邵饰”下注“饰之子勋生二子,曰邈,曰遇。邈二子,景先,景纯。纯生彦。遇六子,三曰余,生亢。亢生塤,箴”^{[6]964}。《重修丹阳县志·卷十八·仕进》:“邵塤,字伯友,亢子。邵箴,字仲恭,亢子。”^{[22]773}《邵铭》《至顺镇江志》与志文相合,世系传承为邵饰-邵勋-邵遇-邵余-邵亢-邵塤、邵箴、邵琬、邵琰-邵缙。^①

邵饰。《京口耆旧传·卷三》^{[31]30-31}:“邵饰,字去华,丹阳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以进士擢第,赐同学究出身。初任福州福清尉,吏部铨判超等。知南康军星子县,用荐者改秩。知杭州仁和县。

未岁,移知益州双流县。任满回知苏州长州县。凡四为邑,所至吏畏民爱之。通判处州,就移知巴州,辞以不便婚嫁,改知通州、南剑州。近臣有荐堪充刑狱钱谷任者,升知吉州,未逾月就移提防荆湖南路刑狱公事”。时衡永等郡“蛮獠为盗”,邵饰治理有效,“诏书褒美,移两浙路转运使,改知寿州。召还,充三司盐铁判官。出为福建转运使,移淮南转运使,课最他道,增秩奖谕,复为盐铁判官”,时朝廷议改茶盐法,邵饰之法“公私两利,中外大悦”。“居无何,除江淮都大发运使,会有言其年高,改知潭州,未行,改宣州。到任未一岁,改苏州。居三月,又改明州,引年致仕。嘉祐三年(1058年)卒,年七十有三”。《吴郡志》:“庆历中,有尚书考功郎中邵饰为吴郡守。”^②“尚书考功郎中”、“吴郡守”旁书未见,可补。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迁两浙漕”^{[25]3559}。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两浙转运使邵饰降知洪州”^{[25]3556}。则其任寿州提点前曾“知洪州”。《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二十三日,三司请置河渠一司,专提举黄、汴等河堤功料事。从之,命盐铁副使刘湜、判官邵饰主其事”^{[4]3141},知其皇祐三年(1051年)任三司盐铁判官。《续资治通鉴》: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四月,“金部郎中邵飭(饰)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命下未赴,皆为御史所弹”,“(壬午改命)兵部员外郎李徽之代飭(饰)”,“飭(饰)知潭州”^{[25]4141},结合《京口耆旧传》“邵饰”小传知其未实际赴潭州任,以金部郎中知宣州。梅尧臣有《送邵郎中知潭州》一诗,即是写给邵饰,“邵郎中”与“金部郎中”合。皇祐五年(1053年)任宣州知州^③。

①《浙江鄞东邵氏宗谱》之“赞邵普公书”载:“公普,字大仁,曾祖父安简公,居姑苏,官吏部尚书,祖父原玘公为山东福山县县令,终于署遂居于福山。父仲贤,未仕。叔父仲德,知明州持节诸军事,卒于署,家于郡治之西北隅。公为会稽承事,深欲戮力扶宋,及闻遣使臣金,即解组公庭,隐居于鄞东梅江南里。”《鄞县县志》《鄞县通志》皆沿袭此说。然墓志所述邵亢之子名和字与“原玘”不合,故不予采信。邵启龙先生认为宗谱上的内容记载是确切的,同时鼓励笔者把有疑问的地方提出来,供学者讨论研究。

②见(清)严可均《严可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65页)“虎丘山题名三种”引范成大《吴郡志》内容。书中据“知长州县事”指出邵饰“由县令为郡守也”。

③《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17页有《送邵郎中知潭州》一诗;第656页有《送宣州签判马屯田兼寄知州邵司勋》一诗。寿涌先生《〈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再注八十四则》(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一文据《姑苏志》卷三卢氏按语:“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以金部郎中知宣州”考证“邵饰在皇祐四年秋至宣州,五年(1053年)秋离开宣州”。北宋文官阶官叙迁是三年一迁,金部郎中属户部,中行;司勋郎中属吏部,前行。中行郎中的升迁应转为前行郎中,邵饰由“金部郎中”升“司勋郎中”。

邵塤，字伯友^{[22]773}，“以父亢恩任池州判”^{[22]649}。由志文知熙宁八年（1076年）“守秘书省校书郎”。《重修丹阳县志》载：“邵塤，字伯友，亢子，长社县主簿，入管当文思院。出知婺州金华^①，救荒有名，通判滁州，卒于官。”^{[22]773}《京口耆旧传·卷三》：“为太庙斋郎，调许州长社县主簿，迁太常寺太祝，监杭州粮料院。元祐初，曾布经略河东，辟为属，掌文翰，还管当文思院。出知婺州金华，救荒有名，通判滁州”^{[31]36}黄河流经山西西境，成南北线，故山西境内，在黄河以东者，统称“河东”，指山西^{[14]514}。《山右石刻丛编·第3册》^[32]“曾布等祷雨题记”载“龙图阁学士、河东经略安抚使曾布”率僚吏祷雨，“丹阳邵塤，伯友恭谒”。刻石时间为“元祐丙寅岁七月”，即元祐元年（1086年）。《太原历史文献辑要·第3册宋辽金元卷》^[33]“李长者祠题刻四段”记载鲁郡侯曾布拜谒李长者像时“丹阳邵塤”等偕行。石刻在寿阳县（今山西省晋中市），刻石时间为“元祐己巳岁六月”，即元祐四年（1089年）。《续清凉传》载：元祐三年（1088年）六月，“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邵塤，来会于东台”^[34]。“来会于东台”之“东台”在五台山（今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为宋经略安抚使的属官，宋置河东路，辖“山西长城以南，闻喜县以北全境，及陕西葭县以北”，治所“山西阳曲县”^{[14]515}。“曾布经略河东，辟为属，掌文翰”与“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记载合。可知邵塤元祐元年至四年任河东路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是时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曾布的属官。

邵箴，字仲恭，熙宁六年（1073年）登进士第三丙科，“管当在京南排岸，擢为司农寺丞，累至显谟阁待制。知瀛州，以名在当籍，差知常州，移苏州，卒”^{[6]969}。《重修丹阳县志》载：“邵箴，字

仲恭，熙宁六年（1073年）进士。除司农寺丞，迁都官郎中，擢京东转运副史。时西边用兵，鄜延屯戍多而财用少，惟箴久任，以称职闻。”^{[22]773}神宗时“神宗亲擢提举开封府界常平”。哲宗时“入为开封府推官”，后任郑州知州、金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河北兼措置采使、邓州知州等职。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内现存《谒太史公祠》碑，宋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春知同州事邵箴撰^②。徽宗时“除直龙图阁，知秦州兼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移知青州道，改郛州^③，除显谟阁待制。知瀛州”^{[31]36-37}。志文所及太常寺太祝官职，史志不载，可补。

邵亢长女琬嫁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葛奉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六》：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壬申朔，“杭州钱塘县丞葛奉世为太常寺奉礼郎”，“充大理寺详断官”，“以试断案合格也”^{[25]5987}。“详断官”掌定断各地申报疑而未决狱案，报送审刑院。建隆二年（961年）制，“详断官八人，以京官充”^{[12]2441}。宋初，“大理正、丞、评事皆有定员，分掌断狱”，后择“他官明法令”但不在朝日常参的官员兼大理寺丞，“谓之详断官”^{[12]2441}。熙宁八年（1075年），任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元符二年（1099年）乙未，“提举详定编敕成书”，“删定官葛奉世”^{[25]12289}。“编敕”是宋代以皇帝诏令形式删补法律条文的制度。哲宗绍圣后“以删立法令”为职责的机构是“详定重修敕令所”，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和一定数量的胥吏组成^[35]。

邵亢次女琰嫁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许安石，开封襄邑人，大中大夫许拯四子^[1]。父许拯（字康伯），子许颜（字彦回）^[36]。许安石熙宁八年（1075年）时任楚州淮阴县尉。元丰六年（1083

①《金华县志·卷三》（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载：“邵塤，绍兴四年（1134年）任职。尝口碑石为县题名记。今废。”《金华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7页）“宋知县名录”载：邵塤，绍兴四年（1134年）任职。“塤”字误。

②是碑简述见贾俊侠，蔡晓汀《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唐都学刊，2014年第6期）。邵箴《谒太史公祠》碑文：“元祐五年（1090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诏书，委所在长吏躬祷境内名山大川。将以戊午有事于韩城之禹庙，乙卯道出少梁，恭谒太史公祠”。

③“郛州”即今山东东平县，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改郛州为东平府。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八载“邵箴高鼻圈髯，以上殿泄气出知东平”，“改郛州”疑即因此事。

年)任黄州麻城县令^①。“元丰七年(1084年),深泽被大水淹没,庙学倾废”^{[37]9}许安石“治之有方,城赖以全”^{[38]6810}。“元祐二年(1087年)六至八月。深泽建庙学,知县许安石选址创建”^{[37]9},“民被其化”^{[38]6810}。^②由此知安石任麻城县令在水患之前,《报告》考“对深泽水患‘治之有方’,迁黄州麻城县令”^[1]误。明代闽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广德寺”条目下载:“崇宁二年(1103年)癸未梓州路转运判官飞骑尉赐绯许安石”^[39],可补其历官。《陶山集》辑录有《依韵和许安石》(见宋·陆佃《陶山集》之卷三)一诗,可知许安石擅诗文。

六、葬地与功德寺

志云: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十七日,以疾终于亳州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七。后六十六日,公亦薨。其孤奉二柩归葬于丹杨,实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铭曰:曲阿之东,耿岗之原。岿然高者,邵公之坟;附而藏者,公之夫人。

强氏熙宁七年(1074年)离世,“享年五十有七”,推知生年为天禧二年(1018年)。邵亢“熙宁七年”(1074年)终,“享年六十一”,推知生年为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邵亢夫妻合葬墓考古发掘时仅发现强氏夫人墓志一合,连小刚老师指出“按照常理来说,邵亢墓中应该有其本人的墓志,但是该墓曾遭严重破坏,故未发现”。

《至顺镇江志》:“宋龙图阁直学士邵必、通判约史、枢密亢墓,俱在上德乡耿冈。”^{[6]719}《邵铭》:“葬润州丹阳县上德乡耿岗原”^{[16]492},即今江苏省丹阳市大泊社区王家村。邵亢去世后,“上遣使致祭,手诏曰:‘亢,藩邸之旧,可优赐以官,赐谥’。官其亲属五人,所推恩各升二等,即其乡造宅五十间赐之”^{[26]6304},“辍视朝一日,特将币牢以致祭,赠吏部尚书,谥安简”^{[16]492},“上为治大第里中”^{[16]492},

“铭曰:‘公丧东归,洒以御觞,其赠伊何,尚书之章’”^{[16]493}。另敕建有功德寺,《至顺镇江志》载:“孝感院在县东北三十里,枢密安简邵亢之功德院。”^{[6]569}。《重修丹阳县志》载“邵安简祠。在耿冈,宋熙宁中敕赐祠地,场字二百六十五号,地二十一亩三分二厘三毫。”^{[22]448}《丹阳县志补遗》:“孝感寺。县东北十五里耿冈。宋枢密邵安简公功德院。熙宁间敕赐善庆孝感禅寺,僧无业建。明正统、景泰间相继增修。”^[40]可知该寺明时仍存。

七、职官与地理

墓志所见宣奉郎、守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同判登闻鼓院、秘书省校书郎、太常寺太祝、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等职官名可借以探究宋职官制度。由秀州嘉兴县主簿、楚州淮阴县尉可知宋时嘉兴县属秀州,淮阴县属楚州,与《宋史·志第四十一》:“嘉兴府,本秀州”“(秀州)县四:嘉兴,华亭,海盐,崇德”^{[12]1395};楚州,“县四:山阳,盐城,淮阴,宝应”^{[12]1396}记载合。由亳州,及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人、福昌县太君几个封号,可以看宋熙宁间亳、晋阳、晋陵、丹阳、福昌的行政建制。墓志“丹阳”刻作“丹杨”,为丹阳地名写法的历时变化提供了实证材料。

八、结语

丹阳郡强氏夫人墓志的出土,为了解和研究强氏及其夫邵亢的生平、家世传承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本文梳理了强氏夫人封号;考证了邵亢生母为葛氏;志文所载邵亢“茂才异等”可与史志互证;简述了“古婚礼”及宋“升行”制度的内容;志文所及职官、地理名称可资研究宋代职官制度、行政建制等。

①(宋)陆佃《陶山集》之卷十四《许侯墓志铭》载许安石之父许拯元丰六年(1083年)卒,许安石时任黄州麻城县令。

②(清)王肇晋纂修《河北省深泽县志·卷三》(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63页)载:“至圣庙在县治东,宋元祐三年(1088年)县令许安石创建。”清·宝琳纂修《定州志·卷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482页)载:“先师庙在县治东,宋元祐三年(1088年)县令许安石创建。”按“庙学”即设于孔庙内的学校,孔子尊号为“大成至圣先师”,“至盛庙”“先师庙”名异实同。今河北省深泽县东大街“深泽文庙”仅存主体建筑“至圣大成殿”。

(本文写作过程中,镇江博物馆文博保管部连小刚老师对墓葬、“邵亢母姓氏及封号”等作了指导,宁波方言研究学者、原鄞州区科协副主席邵启龙先生对家族世系部分作了回复,安徽潜山邵氏宗亲江节先生分享了相关电子资料,在此谨并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霍强,连小刚.江苏丹阳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J].东南文化,2018(4):12-17.
- [2] 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 [3] 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2)[M].成都:巴蜀书社,2003:647.
- [4]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5] 王力.古代汉语:第3册[M].校订重排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
- [6] 脱因,修.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M]//黄成助,编.中国方志丛书.民国十二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 [7] 常山县史编纂委员会.常山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623.
- [8] 连小刚,庞艳霞.邵亢相关问题考述[J].镇江高专学报,2017,30(3):6-9.
- [9] 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字典[M].2版.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 [10] 汉语大词典纂处.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
- [11] 冷玉龙,韦一心,等.中华字海[M].北京:中华书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 [12] 脱脱.宋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13] 胡宿.文恭集[M]//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14] 臧励酥.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 [15]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M]//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6] 王珪.华阳集[M]//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 [17] 邓文华.景州金石[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25.
- [18] 沙迹,李建华,杨庆昌.营口碑志辑注[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368.
- [19] 李百勤.河东出土墓志录[M].太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72.
- [20] 汉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
- [21] 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6074.
- [22] 刘诰,修.徐锡麟,纂.重修丹阳县志[M]//黄成助,编.中国方志丛书.清光绪二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 [23] 袁菊花.北宋南郊郊祀制度变革研究[D].延安:延安大学,2018.
- [24] 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
- [2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6] 毕沅.续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2008.
- [27] 关婷婷.浅论古代婚仪“问名”的历代沿革[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30(3):82-85.
- [28] 孙旭.宋代驸马升行探微[J].宋史研究论丛,2009:51-65.
- [29] 周绍华.宋代驸马升行制度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9(8):156-160.
- [30] 严其林.镇江进士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93.
- [31] 佚名.京口耆旧传[M]//王云五,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2] 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第3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28.
- [33] 胡建林.太原历史文献辑要:第3册 宋辽金元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482.
- [34] 慧祥.古清凉传[M].陈扬炯,冯巧英,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24.
- [35] 孔学.宋代专门编敕机构:详定编敕所述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4-21.
- [36] 郑慧霞.卢仝综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157.
- [37] 深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深泽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 [38] 李鸿章.畿辅通志[M].光绪十年影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 [39] 四川省遂宁市《广德寺志》编纂委员会.广德寺志[Z].遂宁:四川省遂宁市印刷厂,1988:142.
- [40] 胡为和,修.孙国钧,纂.丹阳县志补遗[M]//黄成助,编.中国方志丛书.民国十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83.